



乐感文化与诗性书写

——孙犁《荷花淀》论析

■芦海英 傅金祥

孙犁的《荷花淀》这一“荷花淀派”的经典性作品,以诗情画意和革命乐观主义而著称,这一类作品能够使读者充分体会乐感文化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对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士气有着积极意义;但为创造乐观的艺术氛围,将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境界无限地拔高,回避灾难与痛苦,将现实生活诗意化,却是这类作品的缺憾之处。

[关键词]荷花淀派 乐感文化 诗性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3-0132-03

芦海英(1963—),女,淮海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傅金祥(1957—),男,淮海工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江苏连云港 222005)

《荷花淀》是“荷花淀派”的代表性作品,它以在战争中表现的诗情画意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著称,可以说是“红色经典”的源头性产品。而经典化也就“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彼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1](P43)。正如洪子诚所说:红色文艺作品“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做出证明,以具象的形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2](P170)。由此,《荷花淀》等几部作品及其影响形成了一个流派,确立了一种当代新的审美范式,孙犁便是这一流派的鼻祖。但为了创造乐观主义气氛,不惜回避灾难与痛苦、任意想象与粉饰生活的创作倾向,却削弱了这类作品的真实性。

阅读《荷花淀》是令人快慰的。小说从水生女人编着苇眉子等丈夫回家写起。村游击组长水生等七个青年,没有和妻子商量便在区上报名参加了大部队——地区队。水生被推举为代表回家与家人告别。作者着力写水

生夫妻对话,意在表现抗战岁月里新一代青年男女的精神面貌。对话描写精炼而蕴藉,既勾勒了舍家报国、奋勇当先的农村青年水生的形象,更烘托出了水生嫂这位勤劳、贤惠、深明大义的农村妇女形象。小说后半部分勾勒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水生嫂等妇女们探望丈夫而未如愿,归途中意外地遇到了鬼子的汽船,她们却并不惊慌,机智地划着船向荷花淀里躲避,恰好将敌人引入战士们的伏击圈,使战士们大获全胜。整个小说洋溢着欢乐的气息,让读者能够充分感受到乐感文化带来的快感。

《荷花淀》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根据地人民的美好情操和精神风貌,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小说采用本色的散文化结构及白描手法,于从容委婉的简笔勾勒中,将残酷的斗争生活点染得风光旖旎,洋溢着清新的格调和欢快的笑声,极具诗情画意,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因此,《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后,立刻“带着浓郁的芳香吹遍解放区和大后方”^[3](P77),并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被誉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典范。在孙犁笔下,抗战生活简直如同赶庙会、逛公园般轻

松快活,鬼子兵像稻草人一样不堪一击。

当然,我们并没有忘记,孙犁是在写小说,艺术创造有充分虚构的权利,包括充分利用偶然的权利。安徒生可以写出《皇帝的新装》,卡夫卡可以让人变为甲虫,莫泊桑、欧·亨利都是擅长利用偶然和巧合的大师,孙犁为什么不可以呢?仅仅追究这一点显然毫无意义。从今天的文学观来看,一般用“生活真实”来要求文学,显然并不合理——在此,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孙犁为什么要这样虚构,而读者为什么喜欢这一文本并推为典范,这种叙事结构怎样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阿尔都塞曾经详细地论述过意识形态对个体的作用,他说:“因为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4](P203)}作为延安一知识分子的孙犁自觉被这种集体所召唤是不难理解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孙犁也顺应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而这种文化总体看来属于一种乐感文化,不乏的是粉饰与乐感,缺乏的则是悲剧精神与人性深度。《老人与海》、《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永别了,武器》如果让中国人来写,小说中的英雄可能是另一种姿态。然而,以这种方式来写英雄,可能使小说中所体现的人类意识及人性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大为损伤。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定:假定《荷花淀》中写了水生嫂等女人们所承受的灾难和痛苦,或者写战士或女人们伤亡惨重;那么,小说的情调将会是低沉的,小说也可能失去了浪漫情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倘若如此,《荷花淀》还会获得广泛的赞誉吗?可见,这种浪漫情怀和“乐感基调”是小说获得巨大声誉的基础。

毋庸置疑,正是《荷花淀》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延安文学,为后世的“红色叙事”文学开了先河,提供了范式。这种叙事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生活与人性中本真的血肉丰满、带着全部喜怒哀乐的“个人记忆”,变成了经过精心酿制的“集体记忆”,于是,往昔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被忽略了,剩余的东西却像是经过提纯处理后单纯而透明的蒸馏水,《民兵斗争故事集》是这类

“集体记忆”的典范。

从更深处看,这问题实际涉及了一个在今天不应回避的问题,即真实性与价值性(功利性)的矛盾。众所周知,孙犁在冀中抗战学院教授抗战文艺时,因言必称“典型”,曾被学员们称为“典型教官”,孙犁又是以强调文学的“真实性”而著称于文坛。何谓“典型”?何谓“真实”?这些问题很难说清楚。如果小说过分追求自己所喜欢的“诗意”格调和浪漫色彩,而不乐于正视严酷的现实,“典型”和“真实”是否会受到质疑?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晚年的孙犁在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活重新提起笔后,其作品基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在文化和深层内心世界上可以用他自己的感慨来表示:“这场‘大革命’,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5](P5)}他创作了大量的纪实性小说、散文,对生活中的种种污秽及人性的丑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被认为是由过去写“美的极致”过渡到写“邪恶的极致”,呈现了其创作生涯的“第三个高峰期”^[6]。他在古稀之年一改《荷花淀》的“乐感基调”,以沉重的社会内容和沉郁、冷峻的风格,赢得了同辈人在晚年很难再次赢得的称誉,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创作路径的重大转变。同样,20世纪50年代开始师从孙犁的刘绍棠,新时期的创作依旧沿袭了“牧歌式”的模式,以歌颂传统道德的人性美、人情美为旨归,执著于传统的喜剧结局。其作品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过多的理想化有时弱化了反映生活的深刻性”,“较少来自生活的发现,较少切入现实的深刻内容,因而减弱了震撼当代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3](P442)}人们戏称,这位当年的“神童作家”几十年的右派算是白当了。

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引申开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乏的是那种乐感式的作家,那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稀缺的是鲁迅式的深具悲剧意识的作家。就连最崇拜鲁迅的冯雪峰等人也不能理解而将鲁迅的寂寞、孤独、悲观视为局限性,而当他们遭受了生活的磨难后,应该能够理解鲁迅悲观的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在特定的年代,对革命战争的歌颂,用诗化小说进行“战争审美”。《荷花淀》等作品对于激发民族战斗性、鼓舞战争士气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但也不能不看到,回避丑恶与酸楚,将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境界无限地拔高,为创造乐观主义气氛,将现实生活诗意化,不惜任意想象、夸饰,却是这一类作品的缺憾。如果说,《荷花淀》之类作品虽然浮夸了些、简单化了

些,但其特定的思想内容决定了这类作品本身并没有什么负面效应;那么,作为一种创作倾向、一种精心虚拟的叙述模式,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浪漫主义的泛化,则会蜕变为回避现实矛盾,无视百姓苦难和真实心态的任意虚构和捏造。“我们多的是廉价的乐观主义,缺乏的是那种雄视宇内、叩问苍天的气魄和探石发穴、穷究物理的执著;我们多的是笼子内的百灵、鹦鹉,而少的是乌鸦和猫头鹰。因而也便多了些纤弱委琐的应景之作,少了些悲天悯人的悲剧情怀和大气磅礴的人文向度。”^[7]描写合作化、大跃进的作品《李双双》、《我们村的年轻人》不正是如此吗?三年“自然灾害”时,农村的生活境况是怎样的,农民的心理状态如何?而杨朔的《海市》、峻青的《秋色赋》置百姓食不果腹的现实于不顾,极力创造莺歌燕舞般的景象。浩然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等、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部,尽管都散发着浓厚的风俗人情气息,颇有荷派作品的味道,但其“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和虚空的生活场景则令人生厌。

我们几十年的曲折道路都是伴同着“凯歌之歌”,伴同着自我膨胀、自我陶醉式的乐观和自信。这种粉饰太平的颂歌固然符合诗意化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展示,同时也拒绝了对客观现实的如实反映,消除了文学最基本的警世职能,使作家在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悲剧意识乃至社会良知消失殆尽。

值得深思的是,同是爱国主义的名篇,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却另有特色。无论小弗郎士、韩麦尔先生,还是郝叟老头儿、邮递员等镇上的人们;无论是儒夫上校,还是小孙女、韦医生。作者虽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强敌面前的英雄,但从巨大的心理苦痛中展现了法兰西民族强烈的悲剧意识和爱国情怀,具有刻骨铭心的艺术

感染力。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富有自信力和浪漫精神的民族,但又是一个深具悲剧意识、不惮于“自绘败状”的民族。如,巴黎油画院中一幅著名的油画——《普法交战图》,它渲染了普法之战中法军惨败的惨烈情景:“每一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弥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这也说明了法兰西民族的审美心理空间和对苦难的承受力与中华民族不同。

所幸的是,从新时期以来的某些作品,如乔良写长征途中湘江之战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来看,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也逐渐强韧起来了。

[参考文献]

- [1] (加)斯蒂文·托托西.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 鲁原,刘敏言. 中国当代文学史纲[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 [4] (法)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 [5] 孙犁. 曲终集[M]. 北京: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 [6] 张学正. 观夕阳[J]. 当代作家评论, 1998, (3).
- [7] 傅金祥. 文学的思维品格及其功能[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3).

【责任编辑 张 丽】